

□吴真

乱世中的文化暗斗

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，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：走，还是不走？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，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、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，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。他决定，不躲、不逃、不撤退，留居上海，等待天亮。

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，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“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，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”。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，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，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，公家劫余残书，散落于市面上。此外，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，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，必将流出国门，最终酿成“史在他邦，文归海外”的奇耻大辱。

1937年年底，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，郑振铎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，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“古董”，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。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《古今杂剧》，他的朋友认为“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，战地之伤残破坏，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”。1940年7月，郑振铎在重庆出版《文阵丛刊》第1辑卷首以笔名“源新”发表《保卫民族文化运动》，号召有理智者：“在这最艰难困苦的时代，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！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！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！”主编茅盾、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：“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。”

抢救民族文献，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“迂远”，然而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，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“玉石俱焚”的做法。他认为，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，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，无从弥补。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过这一观点：

珍宝、房屋、工厂，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灭了，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，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，更合理；工厂可以设计得更现代化，更大，更有效力。但文物一被毁灭，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，永远永远地不会再有原物出现，而那原物在文化上，在艺术上，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，不仅是整个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，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。它们的失去，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，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。

“从劫友里救全了它，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！”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，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，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。巴金晚年说：“我批评他‘抢救’古书，批评他保存国宝，我当时并不理解他，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，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，在最艰难、最黑暗的日子里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书的故事，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。”

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，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，郑振铎始



郑振铎的文化抗战：
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

1937年—1945年，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，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，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，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，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”，郑振铎说，“然而我不能走”。在上海，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，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，“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万五千余种”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，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，完成著作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，重现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，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、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，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，机智躲避来自敌方的明枪暗箭，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。

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，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，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“孤岛”的自我救赎与考验。他在1940年9月1日致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：“为国家保存文化，如在战场上作战，只有向前，决无逃避。”

多方势力的三岔口

在上海“孤岛”，各种力量都在或明或暗地交锋着，波谲云诡之下是涌动的暗潮。明权暗贵纷纷进入书业市场，古籍也因此成为“社会精英”的“象征资本”，郑振铎为国家抢救文献，游走其间，自然需要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。

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郑振铎枕戈待旦，时刻警惕，处处提防。当时上海“孤岛”有多方势力争夺古籍，正如京剧《三岔口》那样，黑暗中的打斗，分不清敌人与友人，场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都会让在场人有所反应，甚至导致同室操戈。郑振铎抗战胜利后曾自我评价说：“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，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。”

正是因为黑暗中打斗，郑振铎自己对于日军侵略者的覬覦、监视，其实认知并不充分。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隐秘行动，每一个师团均配备“兵要地志资料班”，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，拟出“接收”（没收）清单，一伺占领，立即展开掠夺。江南

日军随队皆配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，“书画割去四周，以便携带。全部抄完，然后就烧，其幸免的，往往就轮到汉奸抢劫。有时日军一面纵他们抢，一面却故作保护的姿态，让随军电影队拍摄影片，以示‘保护中国人之赤忱’”。1937年12月，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立“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”，随军特派图书馆员假“接收整理”之名，专事掠夺官方机构、学校、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楼的文化资料，之后将这些文献搬运到上海、南京汇总，再挑选精华本运往日本陆军总部。

日军掠夺中国文物不仅有专职机构，而且手法隐蔽，采用民间名义从上海偷运出境，以防日后被追查。张怏伯曾目睹了日军的无耻掠夺行径：

敌兵在镇江，劫得许多古董玩器，装箱运走，嘱由某理发店，代开一假发票，并盖店戳，闻系为避免海关盘诘，究未知其用意。总言，明明系抢劫得来，但要蒙混得过人，即可作为买进来的，所谓“皇军”，于这些鬼祟之事，做得如此之工，真是无所不能。

经郑振铎之手抢救的近三万册古籍，一度被日军劫掠到东京，但因为有郑振铎、陈君葆、叶恭绰等人的细心和努力，中方在战后出具了追索劫物的有效铁证，最终成功将古籍追还归国。

图书的“接收”整理也是日本在华情报工作的重要一环，清水董三（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）主管的“中支建设资料整備

事务所”，专事经济战略情报整理。清水董三曾亲自到上海的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，还试图通过一个当了汉奸的“朋友”来收买他。郑振铎一直以为清水董三只是“管文化工作的”，他有所不知的是，清水董三从1939年3月开始主管沦陷区的图书情报工作，而且也是日本侵华特务机关“梅机关”的日方决策层之一。而“梅机关”的机关长、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，曾特地令人把郑振铎组织“复社”出版的《西行漫记》翻译为日文，作为“极秘”资料派发至各机关。此外还有高仓正三、长泽规矩也等人，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于郑振铎的追踪。

郑振铎始终处于被“围猎”的危险境地，其行动，其研究，其藏书，一直受到日本军界、情报界、学术界的密切注目。当时他隐约知道自己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，但是，危险在哪里，谁是背后黑手，黑暗中到底有哪几双眼睛，哪些“朋友”其实是最大的敌人，作为当事人的郑振铎并不清楚。今天，我们通过解读日方、汪伪的档案，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、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，能够看到当年身处黑暗中的郑振铎，是如何与“某方”进行黑暗中的周旋与打斗。

书籍史视野下的文化抗战

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战争中所历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。1937年—1945年，他写有《失书记》《劫中得书记》《劫中得书续

记》《求书目录》《烧书记》《售书记》《“废纸”劫》等十几篇文章，记有《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篋书目》等八部书目，还有与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抢救文献相关的工作报告及四百多通书信。他还有记录个人访书生活的五年日记，以及分散于各书页上的数百则题跋书话。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战争对于书籍的伤害，具体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对于书籍的文化暴行。

钱振东《书厄述要》指出：“文化之于国家，犹精神之于形骸。典籍者，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。”“书厄”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大量公藏书籍亡佚残缺的劫难。日本侵略中国导致的“书厄”，不仅是北平图书馆、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公藏图书的“书厄”，更是民间藏书的灭顶之灾，其损失之巨，至今无法用数据加以统计。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，也记录下他所目击的民间书籍劫难全过程，这也是书籍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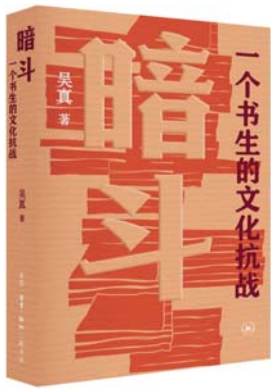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书如何从原藏家手中漂泊到上海？曾经面临怎样的危机（被盗、被烧毁、被卖出国）？它们以什么样的劫后面貌存在（水火痕迹、残缺）？一部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。郑振铎的记录，将“劫中书籍”作为主角，“每于静夜展书快读，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”。

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挣扎，也是郑振铎抗战时期文字的重要内容。郑振铎真实记录了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——烧书以逃死，售书以求生，抢救书籍以抗日，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。

郑振铎周围的开明书店文人圈以及徐森玉、赵万里、陈乃乾、陈济川等友人，皆是以书为职业者。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希望尽可能描绘抗战时期这些“以书为职业者”的群体画像，关注书籍背后的人的生命形态，以及由于书籍的流动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、合作与博弈。

书贾群体虽然在中国书籍流通中起到重要作用，但是大部分的文人文章都把他们描绘成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，而在郑振铎的抗战文字中，他给予了这些书业同人以最大的温情，他说：“我很感谢他们，在这悠久的八年里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。”书贾不仅掩护了郑振铎，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。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在上海抢救的海量书籍，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人，利用民间商运瞒天过海，打通了一条隐秘的“孤岛书路”。

（本文摘自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
吴真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